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5.003

■ 毛泽东研究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 奠定改革开放理论基石^①

顾玉平

(南通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新矛盾也不可回避。如何妥善处理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仍要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中寻找答案。毛泽东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和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立场和方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原则上的指导。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从理论渊源来看,来自于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要全面深化改革,顺利完成“两个百年”的重大历史任务,仍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通过深化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

关键词: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基石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020-08

The Socialist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Theory a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GU Yu-p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eanwhile it has to face a series of newly unavoidable social conflicts.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the way to settle down how to properly handle the curr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o Zedong clarified the socialist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its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method to distinguish and deal wit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contradiction, which provided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ng Xiaoping launched a new journe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ch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o Zedong's socialist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theory i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Currentl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of building an all-round comparatively well-off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theory to set-

① 收稿日期:2013-11-01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DSB006)

作者简介:顾玉平(1963-),男,江苏通州人,教授,博士,南通廉政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tle down the socialist basic contradiction by deepening the main socialist contradictions.

Key words: the socialist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theor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正在为实现新的“中国梦”而努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发展起来后面临的矛盾,这些矛盾若解决不好会严重影响“两个百年”任务的完成。因此,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问题、解决矛盾十分迫切。启动改革开放有诸多原因,什么是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矛盾的症结在哪里?化解矛盾的思路十分丰富,统筹协调解决矛盾的实践理念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思考。本文试着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中寻找答案。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大思路和基本框架,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依然是化解社会新矛盾的钥匙。

一 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及其对改革开放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它贯穿于社会发展过程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不是对抗性的了,但矛盾还会存在。毛泽东依据上述基本思想,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实际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并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性质和特点。这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一,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领域也不例外。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看法,认为社会发展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历史上一切社会的新型社会形态,但是它同其他社会一样同样也充满着矛盾。毛泽东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1]164}毛泽东又指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1]215}确立了这一基本判断后,毛泽东指出,矛盾不是坏事,正是矛盾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当然,矛盾在事物发展中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是不断被发现被解决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也是作为一个过程展开的,对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和解决也有一个逐步被发现、逐步被解决的过程,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发展的。

第二,毛泽东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不但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而且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体现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辩证思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因此主要的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相适

应是主要的、基本的,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状况的,与旧社会相比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的不断前进。同时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也有不相适应的地方,但这是次要的、非根本的。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敌我矛盾是次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由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从总体性质来看已经不是对抗性矛盾,是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有利于为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思路。毛泽东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有序地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内容、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内容进行调整和改革,从而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213-214}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加以解决,即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大框架里,通过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行调整加以解决。现在有些人还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个道理。由于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具体制度和体制尚不完善,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有些方面、有些环节必然存在着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还有贪污腐败,这就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产生党群之间和干群之间的矛盾,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但是总体而言,这些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完善加以解决的,这样就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如果跳出社会主义框架采取激烈对抗的方式处理矛盾,那就适得其反。

毛泽东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具体运用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而且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状况、性质和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立场和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与此同时,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是要正视矛盾的存在。既不能只看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相适应的一面而不去改革开放,也不能忧虑会出现一大堆新矛盾而不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是客观事实,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把事业推向前进。二是改革开放要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展开,改革开放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都要有利于这一矛盾的解决。这里,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完善这一基本原则,又要分清矛盾的不同性质,通过分类指导解决矛盾,不能乱改一气。三是要把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作为衡量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生活领域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这就要求一切改革开放都要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社会主义利益的主体,他们的利益

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的宗旨。背离了这一原则,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合法性。

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那个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还没有充分展开,各种具体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这在客观上造成毛泽东难以完整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形式,也就不能真正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手段。特别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他在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国情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从而导致了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不过应该肯定,毛泽东主观愿望是好的,而他晚年的错误教训也不失为引导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宝贵遗产。

二 改革开放源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

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是从问题开始的。而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确保改革之路顺畅,必先进行理论上的精心准备。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动乱,造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多重危机,各项恢复、重建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对此,邓小平是有理论上的清晰准备的。一是对“文革”进行反思。问题的存在不奇怪,但要开创新局面,首先必须解放思想,这样才能为理清思路扫除障碍。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的第一部分标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是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要有个科学的总结,为党在现阶段的历史定位,为“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基础。这个总结包括许多内容,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291}。三是看清问题的症结。既要走前人走过的好路,又要开辟新路而不走弯路,就需要寻根溯源找准问题的症结。笔者理解,邓小平是从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来判断问题的。邓小平认为,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目的是“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141},在这个基础上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工作蓝图。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不是空穴来风,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有句名言叫“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改革开放这个在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答案的新课题的形象比喻。但决不等于说启动这样一个历史性、全局性、深刻性的大举动也是并无理论支撑的“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和平发展对外开放理论,三大理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大厦的三大支柱。其中,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三大支柱中的理论理念支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和平发展对外开放理论是实践理念支柱。如果说改革开放有石头可摸,那么这个石头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既有毛泽东的科学认识,也有他本人的创新性思考。前者是继承,后者是发展,两者对于改革开放来说缺一不可。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是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理论先导,也是谋划改革开放实践理念的理论支撑。

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依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确定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导。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认为矛盾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存在的,这是客观事实,即使帝国主义被打到了,剥削者被消灭了,矛盾还会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个判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清楚了,尽管没有提到也不可能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这两对矛盾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通用的,是不用质疑的。列宁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时过境迁,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认识就不一致了。毛泽东是沿着老祖宗的话“接着说”,斯大林则前后反复,代表性的主张有两点:一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是完全适合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尽管1952年以后有所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尔·德·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但也只是勉强承认;二是当矛盾出现的时候,斯大林就把矛盾

归结为敌我矛盾,采取极为粗暴的方法来解决。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看法是赞同毛泽东的判断的。邓小平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提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20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181-182}很明显,邓小平是赞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的。这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改革开放从何着手的问题,即在确认这一大视角下着手改革开放才是正路。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的赞同不是形式上表态,之所以这样定位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是经过理论比较的,并经过实践检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前提确立后,下一步就是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问题了。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当然,邓小平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本前提,保持改革开放政治大方向不动摇。

毛泽东的一生是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实际行动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和繁荣富强展开的。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不回避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不回避存在基本矛盾也存在其他具体矛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矛盾都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可以采取多种办法,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他在主观上仍是“四个坚持”的坚守者。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的解决,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来解决。这一点邓小平坚持下来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邓小平在讲到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时说,我们在今天的国家大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这里说到的毛泽东的功绩毫无疑问包括了毛泽东对于“四个坚持”的执着坚守。

从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着手进行改革开放,这是大思路。大思路确定后,怎样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展开,这也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不是小打小敲,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怎样进行改革开放,我们在老祖宗的书本上找不到答案,历史上也没有经验可借鉴。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就有个改革开放宏大叙事铺开有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对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164};“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2]173}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俗称“猫论”。有人联系这句话把邓小平理解为不问姓资姓社的实用主义者了,还举出南方谈话中的一些姓资姓社论佐证。笔者理解,邓小平在具体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上是提倡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但四项基本原则是涉及政治大方向的大问题,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立场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对照邓小平说过的“猫论”具体背景和指向,我想就不会把邓小平的原则立场模糊掉了。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也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处理矛盾的方法原则等等,这里不再赘述。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开辟了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路径,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深化主要矛盾的解决来化解基本矛盾。毛泽东不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

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反映在“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但在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路径上,毛泽东偏重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放在次要地位,到后来甚至忽略不计了。显然,毛泽东没有看到解决基本矛盾的根本点是在生产力上,没有看到经济因素是矛盾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没有看到应该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思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邓小平则回到经济决定论的原点上来,他的所谓“唯生产力论”并不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包括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党的十三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指出,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总思路。

第二,确定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工作总方针,这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关系,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说,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不难理解。稳定是前提,笔者理解包含三层意思。其一,邓小平不认为轰轰烈烈的改革是瞎折腾,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社会乱了,不仅解决不了矛盾,问题反而越来越多。其二,改革开放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会带来新的矛盾。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有新矛盾出现。对此,既不能采取极端的方式招致矛盾的激化,也不能容忍借解决矛盾之名行动乱之实。其三,问题既有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制度,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就决定了所采取的任何一项改革开放举措,如果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那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有确保稳定的战略深意的。

第三,提出了一系列实践新理念,为有效化解矛盾铺设了道路。比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奠定理论基础;改变方式方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或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线统筹协调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解决利益矛盾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法制,运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手段,使矛盾解决制度化和法制化;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国际社会矛盾由对抗性向非对抗性转化树立范例,等等。

总之,邓小平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继承、丰富和发展,为引领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奠定了基础。

三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依然是解决社会新矛盾的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造成的。要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必须继续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把深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作为抓手,开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局面。

第一,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已经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借鉴。

否认矛盾,不从生产力入手来解决矛盾,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矛盾是走不通的,这是斯大林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斯大林在解决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当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给后人留下的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不正视矛盾,导致矛盾的累积而无法解决。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还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矛盾的。但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稳固建立,他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都在缩小、消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完全适合。后来又提出自动适应论,“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3]577}晚年他勉强承认矛盾是存在的,但认为只要发挥好人们的积极性就解决了,如此等等。这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矛盾的认识模糊不清,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长治久

安。二是对矛盾定性不恰当导致实践路径的失误。斯大林后来勉强承认还存在着矛盾,但是把它归结为生产关系纯度不够高,力图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的办法加以解决,比如通过建立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即全民所有制,通过取消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矛盾。但当生产关系的调整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他又将其归结为社会中有落后的惰性力量的阻挠,归结为部分人的觉悟水平不够高,应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样,一旦出现矛盾甚至许多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时,就采取对抗性的解决方式,酿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三是封闭僵化的上层建筑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巩固。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建设时期,形成了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它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在反法西斯战争、支援中国革命和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也有着严重弊端,如人民主体性不足、社会压抑闭塞、生产效率不高、官员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从而不利于凝心聚力解决社会矛盾,反而造成社会的严重紧张。

在指导原则、切入路径、工作方针等方面出现重大失误,不能促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这是戈尔巴乔夫留给我们的教训。一是主张用普世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使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口号,宣扬新思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4][126]}。这样就淡化弱化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乃至放弃党的领导地位,这种做法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否定了党进行革命和执政的思想基础,造成党的威信下降,引发了思想的混乱。二是在工作路径上,没有从发展生产力角度入手,忘记了改革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点,应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经济体制改革会产生利益格局调整,遇到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不能因为碰到困难就另辟蹊径。戈尔巴乔夫后来试图通过强力推进政治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就颠倒了主次,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基本原理,造成了党的垮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三是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在经济改革初期受挫以后,戈尔巴乔夫转而大力提倡公开性和民主化,使得各种思潮得以合法公开地肆无忌惮地涌现。后期所实行的多党制、休克疗法等一些措施,步子迈得太大,后续措施又没有跟进,再加上民族主义、分裂势力推波助澜,结果造成了社会混乱不堪而无法控制,丧失了迂回的空间。这些教训是深刻的。

第二,改革开放仍要以解决主要矛盾入手带动基本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解决。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要继续认清自己的国情,不能因为国力有了大的跃升,人民已经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就以为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可以放一放了,重点考虑切分蛋糕了。实际上,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较低,科技发展水平还较落后,人们的医疗、卫生、教育等需求还没有得到较为满意的满足,这些在解决社会矛盾时是要优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的解决。因而当下仍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抓手,通过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习近平说,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民众要的是实际好生活,不是抽象的理论,解决的主要途径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思想灌输。因此,社会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不是简单地根据几项经济指标如工业、重工业等在国民经济的比例、比值来确定,而要充分考虑人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前苏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工业、军事实力等方面与美国仲伯比肩,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及日用产品却发展不足,这样的生产力并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在资本主义的竞赛中最终会败下阵来。当前我们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但不能自作主张地划定一些领域,彰显一批数字,而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实际需求。

此外,矛盾的解决需要多方面的系统性配合,不能激化其他矛盾乃至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当下社会矛盾形式多样,内容错综复杂,早已超出了矛盾双方利益迥异或互不含混的阶段,变得相互渗透,比如

在此一个项目上两者可能互为矛盾方,但在另一个项目上两者又与他人构成矛盾方,很难说有纯粹的既得利益者。由此当下的改革措施的出台,不能单项突破,必须多方面思考矛盾主方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做到彼此兼顾,相互配合。

第三,确立“三个自信”,牢固坚持社会主义底线是化解矛盾的重要保证。

在旧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屡次尝试均遭失败的情况下,“十月”革命给在苦闷中探求的中国人以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难险阻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压迫制度,建构了新型的人际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先后催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将中国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在此过程中我们结合自身实际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恰当地处理好了各种关系,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文明进步。

实践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这是前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能动摇。目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国内外意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不仅没有消失,甚至还猖狂活动。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守,放弃了改革开放的底线,不仅矛盾解决不了,反而会给不良分子以可乘之机,夸大渲染某些问题,挑起事端,使不成为矛盾的问题变成矛盾,本可以解决的矛盾无法解决。为此,必须坚决反对一些人用普世价值等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论调,诱使我们在解决问题时作无原则的退让;必须坚决反对因为改革开放出现新矛盾而固步自封,不顾社会主义生机的可持续。有学者指出,当前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理论品格,在主体与客体的良性互动中探寻真理”^[5],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坚持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不是僵化封闭,党在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下,需要根据社会的实际变化,观察新事实,分析新问题,总结新观点,升华新理论,促进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更加顺畅快速。

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依然是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针。

改革涉及的问题千头万绪,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必须以稳定为条件,以发展为目的,在改革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凡此一切,都要以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解决为导向。为此,要反对为了保持所谓的稳定而拒绝变革,要知道通过行政高压的手段获取的稳定是表面的、脆弱的和不稳固的。要在发展中追求稳定,通过发展生产力,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他们得到切实的实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国情的复杂性,任何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及民众的接受程度,不可超越当前阶段,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针对当下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一方面,仍要大力支持民众的敢创敢试的探究热情;另一方面,党和政府要加以引导,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总体来说,要确保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合理解决方向上走,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岑鼎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 [5] 鹿增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机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07-113.